

非洲现代文学

(东非和南非)

〔苏联〕伊·德·尼基福罗娃等著

陈开种 唐冰瑚 剑眉 霍久译

鹤九 黄训经校

责任编辑：高 长 荣

封面设计：秦 龙

非洲现代文学（下）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62,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frac{3}{4}$ 插页 2

1981年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 10208·38

定价 1.00 元

目 次

引 言	1
第一章 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 马拉维的文学	5
第二章 赤道非洲文学中的民间创作传统	85
第三章 埃塞俄比亚文学	124
第四章 南非共和国的文学	160
第五章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文学	292
第六章 佛得角群岛与圣多美岛的文学	335
第七章 马尔加什共和国文学	387
结 语	430

引 言

本书是《非洲现代文学》这部学术著作的下册。上册《北非和西非》(1973年出版)一书中,有论述阿拉伯各国的文学和包括扎伊尔(即前刚果〔金〕)、卢旺达在内的非洲大陆西部与中部的文学各章,下册中有论述埃塞俄比亚文学、东非文学和大陆南部各国,即处于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安哥拉、莫桑比克以及南非共和国的文学各章。本书还论述非洲邻近各岛——佛得角群岛、圣多美岛、马达加斯加岛(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的文学。

尽管本书所涉及的各国文学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所有这些国家的文学,以及这部学术著作上册所研究的各国文学,在当代都具有许多共同的倾向。这同大陆上各地发生的、直接影响文化命运的社会变动——如传统社会结构(封建制的,在一些国家中甚至还是氏族部落制的社会结构)的崩溃,以及经常与古代社会制度的残余交织在一起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推广——都是有关系的。在非洲,城市迅速兴起,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级),形成了知识分子阶层。若干世纪以来的生活准则遭到破坏的过程,不仅扩展到曾经沦为殖

民地的国家，甚至扩展到曾经保持住国家独立的埃塞俄比亚。非洲各民族人民全部生活方式的现代化，通常在他们取得独立以后就更加迅速了。

二十世纪席卷非洲大陆的社会变动，引起了文化领域中的变化，其中包括文艺创作方面的变化。早在本世纪的上半期，非洲大陆的各个地区就出现了文艺表现形式的急剧变革，产生了现代化的新的文学体裁——首先是最能准确地反映不断变化中的极其复杂的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各国人民觉悟提高了，起来反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外国剥削和社会落后现象，在这个时期，非洲各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就特别迅速了。^①

非洲各文明地区现代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大致相同的阶段。战胜希特勒法西斯，是非洲文学发展中一个最显著的里程碑。这一胜利表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威信扫地，并且促进了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因此，在评述本世纪上半期（或更早一段时间）那些在文学方面已崭露头角的非洲国家的文学发展情况时，我们一般将其文学的历史分为两个主要时期：1945年以前的时期和1945年以后的时期。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的，例如，对埃塞俄比亚来说，1941年把意大利法西斯军队逐出国土的时期，是一条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但是，即使在这个国家，反映新的社会思潮的作品也只

^① 详见本书上册引言。

是到了四十年代末才开始问世的。

此外，上述文学史两大时期中的每一时期，还可以分为若干重要的阶段：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即非洲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取得了独立的时期。目前对距离今天很近的这一时期的全部意义还很难作出估价；但随后的非洲各国文学的发展却可能迫使我们（这完全是可能的）重新修订今天所拟定的非洲大陆文学发展的分期，而恰恰把六十年代上半期划分为非洲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新时期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东非和南非国家（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赞比亚）中的欧洲语的文学，实际上是在六十年代中才逐渐产生的。

至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为结束期的文学史阶段，其中还可以划分出两个时期：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奴役非洲各民族的时期，以及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殖民制度相对稳定，而年轻的非洲知识分子反抗殖民主义的行动还不够成熟的时期（这种反抗要到四十年代末才完全成熟）。这一分期自然只适用于那些现代文学发展“年龄”最长的文学，而这种文学在非洲大陆是比较罕见的，因为目前享有盛名的非洲文学的大多数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下半期才真正初露头角的。

本书所阐述的各国文学中，现代历史“最悠久”的要数南非共和国的文学。它的进步倾向渊源于十九世纪末，在二、三十年代，特别是三十年代期间，许多国家的文学，如马达加斯加、佛得角群岛等国的文学，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四十

年代至五十年代期间，南非共和国的进步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葡萄牙领地（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群岛、圣多美），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的文学以及在坦噶尼喀（现为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发展起来的斯瓦希里语的东非文学，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在六十年代，东非的英语文学逐步形成。但与此同时，某些国家文学的发展在这十年中却停滞不前，这首先指的是在警察恐怖统治的环境下遇到了相当大困难的南非共和国文学。

本书论述南非共和国文学的一章，内容比较突出。这一章不仅探讨了非洲人和与非洲人结成统一战线的欧洲籍进步作家的文学，而且还探讨了欧洲移民的反动保守的文学。这种文学的使命是保卫这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的种族制度和剥削制度的基础。目前正在恢复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文学特点的这一文学流派，自然不在“非洲文学”之列，然而在说明非洲大陆最大的国家之一的南非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形势时，对这种文学进行分析还是必要的。

第一章 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 马拉维的文学

斯瓦希里语文学

斯瓦希里语文学是赤道非洲一种最丰富的文学。它流传下来的作品不计其数，但在东非之外，便几乎没有人知道了。乍一接触，一般都会觉得这种文学是相当神秘的。初次接触斯瓦希里语的旧文学(古典文学)的读者，会提出以下的问题：在这些作品中，描写非洲的事物为什么那么少，而描写阿拉伯、叙利亚、拜占庭的事物却为什么那么多？我们在这种文学中所看到的，为什么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种敏锐的想象力和鲜明的“非洲”色彩，而是佶屈聱牙的说教、有关神学和世界末日的长篇大论，以及好勇斗狠的宗教狂热呢？这些作品数量这样多，流传这样广，从而证明人们对它们有很大的需求的原因何在呢？它们的作者、读者或听众是些什么人呢？正是这一位不老练的读者在接触斯瓦希里语的现代文学时又会问道：这种文学与传统文学有什么区别呢？在这种文学中，新、旧诗体之间的界限、某一作家的个人特色与公认规范的特点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获得当地评论界高度推崇的某些作品，我们有时却

觉得它们很幼稚、不够成熟呢？现在我们打算来解答其中一些问题。

要了解斯瓦希里文学的特点，就需要简单地叙述一下产生这种文学的地区——东非沿岸地区（现在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历史。

操斯瓦希里语的东非沿岸地带的居民，是在中世纪早期由土著部族班图族同因仰慕当地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肥田沃土而来的阿拉伯移民杂居形成的。在东非沿岸地区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阿拉伯移民运动，从伊斯兰教的最初几个世纪（根据若干史料），即从七世纪开始，直到十八至十九世纪为止。除了阿拉伯人之外，波斯和印度的移民对于形成斯瓦希里文化的共同性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根据十五至十六世纪欧洲旅行家的论述，东非一些城市苏丹国（例如基尔瓦）的居民，是由“马弗尔人”和“卡夫尔人”（多神教徒）构成的。“马弗尔人”就是明显混杂着非洲血统的阿拉伯人，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操阿拉伯语。正是这些人在社会中占居统治地位（根据葡萄牙旅行家巴尔博萨的说法，基尔瓦就是马弗尔人的城市，由马弗尔皇帝管辖）。多神教徒使用班图族的各种地方语言，其中显然是现代斯瓦希里语的古代语言形式占优势，虽然直到十九世纪初在欧洲和阿拉伯文献中并没有提到过这种名称的语言或民族。在社会关系方面，居民分为自由自耕农（瓦汶旺纳）和奴隶（瓦土姆伐），而且不难猜测，只有多神教徒才属于第二类人。但应指出，“奴隶”这个词用在穆斯林的非洲方面，将会

引起一种不正确的联想。比方说，瓦土姆伐的地位比起欧洲封建时代的农奴的地位要优越得多。瓦土姆伐拥有财产和若干土地，还有做买卖和耕种土地的空闲时间。主人可以同姆土姆瓦妇女姘居生子，这些子女同母亲一起都成为自由人，并且有权继承父亲的财产。“马弗尔人”和多神教徒在慷慨的大自然所赐予的比较富足的条件下共处，就成了有利于产生阿拉伯——非洲混合的斯瓦希利文化的环境之一。

关于东非沿岸“马弗尔人”的城市早期文化与文学，人们知道得很少，但与最晚期（葡萄牙入侵以后的时期发展起来的）斯瓦希里文化相比，显然，当地的、非洲的以及印度和波斯的成分在早期文化中占有更大的比重。

瓦斯哥·达·伽马的旅行促使了葡萄牙把东非沦为殖民地。1502—1506年间，葡萄牙人占领了蒙巴萨、基尔瓦和桑给巴尔。到葡萄牙人入侵的时候，“马弗尔人”和多神教徒便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共同抵御欧洲人的侵犯。非洲东海岸的穆斯林文化（它的语言是斯瓦希里语和阿拉伯语并用），可能在这时候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沿海一带城市同葡萄牙人的斗争，引起了南部阿拉伯国家——奥曼和哈德拉毛特——统治者的注意。这两个国家为了帮助信仰相同的兄弟，便对他们加以保护。十八世纪上半期，东非城市国家的统治者在奥曼苏丹的支持下从葡萄牙人手中解放了莫桑比克以北的全部沿海地区。奥曼苏丹驱逐了敌手葡萄牙人之后，力求成为这块获得了解放的领土的名副其实的主人。直到十九世纪的头三十年，他才最终达到了这一目

的。但早在葡萄牙人被完全赶走以前很久，阿拉伯贵族就开始从奥曼和哈德拉毛特向东非迁移。1776年，法国旅行家莫里斯在非洲东部沿海辨别出来的已经不是两个种族集团，而是三个集团：“马弗尔人”、“非洲人”和“阿拉伯人”——尚未与当地居民混合的新来的移民。阿拉伯人这最后一次大迁徙，在文学史家看来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正是这次大迁徙在很多方面确定了流传至今的十八至十九世纪斯瓦希里古典文学的面貌。

对于奥曼要统治整个东非沿海地带的种种努力，当地统治者采取了两面态度。一方面，他们不愿断绝和这个强大盟友的关系，何况这个盟友在血统与宗教上同他们相近；另一方面，他们又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哪怕是部分的独立也好。对奥曼的压力抗拒最坚决的是统治了蒙巴萨一百多年（1727—1837）的马兹鲁伊族。马兹鲁伊族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给十九世纪的斯瓦希里文学史增添了光彩。这一文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就是马兹鲁伊族人，或者是支持马兹鲁伊族的斗争的人。在赛义德·萨义德（1804—1856）统治时期，奥曼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赛义德·萨义德被认为是东非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这位坚毅不拔的政治家在东非和奥曼这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斗争；他在这两个地方还没有完全控制住局势，因而必须平息频繁的骚乱。他利用马兹鲁伊家族内部的纠纷，在三十年代末从马兹鲁伊族手中夺得了蒙巴萨，逮捕并放逐了那里的统治者。赛义德·萨义德是在桑给巴尔

度过自己统治的最后几年(1840—1856)的。当时的桑给巴尔已经成为东非联合帝国的首府。在他执政的时期，桑给巴尔与法国、英国、美国和西方其他几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赛义德·萨义德死后，国家实际上被他的几个儿子瓜分了。桑给巴尔及其沿海一带从奥曼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苏丹国。这个“铁腕人物”离开政治舞台造成了一个真空，欧洲列强便赶忙乘虚而入。英国帮助桑给巴尔在形式上脱离了奥曼，但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接着而来的是东非紧张的地理考察和发现的时期，然后是欧洲国家对这个地区实行殖民化和瓜分的时期。瓜分的结果，桑给巴尔和肯尼亚终于落入英国之手，坦噶尼喀则落入德国之手。

斯瓦希里语属于使用广泛的班图语系，赤道以南的非洲土著居民几乎全操班图语。斯瓦希里语与其它班图语不同之处是，它的将近三分之一的词汇是由阿拉伯语词根构成的；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斯瓦希里文化渊源于阿拉伯和非洲的混合文化。同时，斯瓦希里语的语法完全没有受到外来语的影响，在斯瓦希里语中，全部阿拉伯语词根都是按照班图语系的典型方法构成的。

斯瓦希里语有三种方言——北方方言、中部方言和南方方言。几百年来，它们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已经有所变化。沿海一带政治生活的中心，以及与这种政治生活有联系的文学创作的中心，逐渐由北南移。迄今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斯瓦希里语文献说明，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沿海一带最有影响的方言是北部苏丹国巴特和拉穆的方言。第一

部保存下来的古代文献《古体杂诗赫列卡利》就是用这种方言写成的^①。十九世纪初,这两个一度十分繁荣的苏丹国已经衰落了。与此相反,蒙巴萨作为与奥曼的扩张进行斗争的中心,它的政治作用却增长了,它的方言——介乎北方方言和中部方言之间——也变成了一种主要的文学语言(见后文论及穆亚卡的诗的部分)。自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桑给巴尔成了沿岸一带的政治中心:它先是马斯卡特(奥曼)苏丹的驻地,后是桑给巴尔苏丹的驻地。属于南方方言的桑给巴尔方言就成了现代标准斯瓦希里语的基础。

自十九世纪中期,先在商队贸易的影响下,后来又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斯瓦希里语开始由沿海一带传到大陆内地。到了四十年代,第一批欧洲传教士在东非出现的时候,斯瓦希里语就由桑给巴尔商人传到内地商路沿线一带的城市和农村。传教活动要求在沿海各部族之间以及沿海和内陆之间架设语言的桥梁。传教士们,首先是路德维希·克拉普夫和爱德华·斯蒂尔,发觉斯瓦希里语非常便于达到这一目的,并为欧洲人研究这种语言奠定了基础。显然,当地没有任何一部有关斯瓦希里语语法的著作。在五十至八十年代,传教士们发表了第一批关于斯瓦希里语的重要著作和用斯瓦希里语写的印刷经文,如路·克拉普夫出版了语法书

① 不久以前在果阿(印度)的档案中发现用阿拉伯文写的十四封斯瓦希里语书信,其中包括从基尔瓦(东非沿海的南部)发出的书信。信件书写的时间是1711—1728年,而且显然带有北方方言的特点。

(1850)、大词典(1882)和其他一些经文,其中包括《圣经》的译文;爱·斯蒂尔出版了语法书(1870)、桑给巴尔史(1867)和故事集。英国和德国教会还开始发行第一批斯瓦希里文的报纸:《姆西穆里齐》(《说书人》,1888)、《哈巴里—札—姆维齐》(《每月新闻》,1895)、《博旺尼—纳—巴拉》(《沿海与内地》,1910)。这些出版物中刊载的斯瓦希里语文章,都是用拉丁字母印刷的,这有助于斯瓦希里语书籍由用阿拉伯字母印刷改为用拉丁字母印刷。至今仍被认为是斯瓦希里语经典作品的早期印刷书籍之一,是描写沙姆巴尔族种族纠纷中的爱情故事。该书共三卷,于1895—1907年先后出版。

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用斯瓦希里语出版了许多科普读物和实用教科书:非洲史、地理发现史、传记、卫生指南、社会生活守则、森林学、畜牧学等等——总而言之,在那时可以看到大致和现在北尼日利亚相同的情景。但是,书籍出版和新闻广播事业在东非沿海比在北尼日利亚更为发达,因而在大城市中便产生了类似西方的那种大众文化。1923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开始发行附有插图的月刊《马姆波·勒奥》(《今日纪事》)。它和在内罗毕出版的类似杂志《阿非利加·尼奥塔》(《非洲之星》),都属于销路最广的期刊。

就流传至今的古代文学作品的质量与数量来看,斯瓦希里文学可算是东方的伟大文学之一。它的历史一般可分为两个时期(就文学作品的流传时间的长短和性质来说,这

两个时期的时间是很不均等的)：古典文学时期(从中世纪起直到用斯瓦希里文印刷的大众出版物的出现，即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止)和现代文学时期(从二十年代起直到现在)。斯瓦希里古典文学，几乎全是诗歌。经过若干代诗人提炼并且进行了规范化的诗歌语言形式，是表达任何思想——不仅艺术思想，而且还有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工具。在斯瓦希里古典文学的各种体裁中，有史诗，它是描写伊斯兰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和东非神话的一些片断的冗长的叙事诗；其次是长篇的醒世叙事诗，它用通俗的形式叙述伊斯兰教的神学与伦理的基本教条；还有脍炙人口的政治抒情诗和讽刺诗、哲学诗与格言诗、爱情诗；最后还有无数即兴诗，因为斯瓦希里诗人善于利用传统的诗歌形式来发挥任何一个实际上是信手拈来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题材。散文只占次要的地位，而且一般显然都不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这是由于古典文学时期斯瓦希里散文的范文流传下来的数量微乎其微，巴特和其他苏丹城市国的编年诗算是例外，因为这种编年诗较之艺术性散文，具有完全不同的作用。与此相反，诗歌作品的手稿却大量保存下来。积极搜集和发表这些手稿的工作，在整个本世纪内仍在继续进行。

在数量方面，斯瓦希里人的文学作品较之豪萨人的文学作品多得无法比拟，后者也受伊斯兰的影响，但文学传统却较贫乏。为了比较起见，不妨引证下列事实，即豪萨人史诗中并没有什么典范的史诗作品，或者说，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确实存在过这种史诗。已知最早的豪萨语作品创作于十

九世纪初期，待到记录成文字，在时期上就晚得多了，而现存的斯瓦希里语文学第一批手稿的创作时期则为十八世纪头三十年；现代豪萨语文学实际上是在一块空地上产生的。豪萨语文学的艺术性主要源于民间口头创作，是人民的智慧及其特有的幽默感和健康的思想。过去，豪萨人当中没有任何一些可以列为现代作家楷模的著名人物，也没有经过提炼的诗歌传统与规范，而在斯瓦希里古典文学中，这两者却兼而有之。

如果继续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虽然这两种文化历来都是拿从可兰经中吸取来的共同思想和共同形象作为自己的养料的，但伊斯兰教对豪萨人和对斯瓦希里人的影响却不相同。豪萨人也象西苏丹的其他民族一样，是从第二手、甚至第三手中——从外来的柏伯尔商人和马里空谈玄理的学者手中——接受伊斯兰教的。豪萨人各城市的伊斯兰教也和相邻的马里帝国和松加依帝国的伊斯兰教一样，是与非洲自古以来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豪萨族的居民群众看来，伊斯兰教就是上天规定的一套行为准则和宗教仪式，这些行为准则和宗教仪式是为了顺利发挥社会与国家的职能所必需遵守的，但并不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豪萨族穆斯林中的大多数人对当地伊斯兰教教义的《摘编》，主要是对它的法律方面（即“沙里阿特”——伊斯兰教法典）感到满意，但对于神学的奥妙、真主的属性、先知和他的女婿阿里、伊斯兰教圣徒们的生活细节等等，则不特别感到兴趣。只有受过教育的社会上层人物

(富拉尼人)才通晓伊斯兰教神学和阿拉伯文学，而对这些人，豪萨族居民则是疏远的，不友好的。

操斯瓦希里语的沿海一带“马弗尔人”和阿拉伯人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后者认为伊斯兰教并不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外来宗教，也不是仅仅归结为几十条背得滚瓜烂熟的信条。在阿拉伯移民看来，伊斯兰教是一份生气勃勃的文化——宗教遗产，是他们的生活哲学，是诗人的灵感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些移民尽管在种族上已经与班图黑人混合，并且用他们的语言写诗，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是古代传统的保护者。比起较为偏僻的西苏丹来，东非沿海一带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要更加直接、更加广泛一些。阿拉伯文学的情节、题材、形象和诗的形式，源源流入斯瓦希里文学，而在斯瓦希里文学中，大部分是由阿拉伯文的翻译作品和经过改编的阿拉伯文原作形成的。古典文学时期的许多巨著，例如《古体杂诗赫列卡利》、《拉斯—阿尔—古里》、《古体杂诗—阿尤布》，它们所描写的完全不是东非的事件。在欧洲研究人员研究斯瓦希里语文学的早期阶段（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它的情节和哲学上），便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这种文学只不过是阿拉伯文学的分支罢了。今天，不能认为这种解释是令人满意的。引进外来的题材和情节，并不影响许多国家文学（例如古代俄罗斯文学）的民族特性。斯瓦希里文学的情况，显然也是如此，它的富于诗情画意的境界至今才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

上文已经谈到，斯瓦希里古典文学从最早的典范作品